

乡志记载日寇暴行

□ 贺志华

1995年1月，首部《梅山乡志》始编（我本人也是编辑人员之一）。那一年正逢抗战胜利50周年纪念日，为揭露日本侵略者在梅山犯下的罪行，乡志办十分重视“战祸”一章有关“日军暴行”的编写。乡志办资料组人员分两组深入梅东、梅西各村作细致的采访、调查，并反复核实相关资料，力求真实反映历史。现摘录该章节相关文字如下。

1940年初春，日军一小队坐艇自盘峙渡口登岸，将渡口旁修船工匠4人绑船，泼上汽油活烧死，人船俱焚，化为一堆焦炭，其状惨不忍睹，而日军则在一旁哈哈大笑。同日，日军持枪窜入盘峙村，枪杀、刺杀胡成大等村民3人，烧毁民房24间，强奸妇女数人。随后窜入梅山村，肆意烧毁民房146间，日军荷枪实弹，侍立火区四周，不许村民扑救，直至屋塌倒。见两位村民手捧《圣经》在火区外路边跪地祈祷，用刺刀残忍地将两人杀死。

1941年4月某日，日军一小队从盘峙登陆，窜入里岙村，在埠头庙门口抢杀税务员1人和外地乞丐1人。随后窜至庄中，将睡在床上的沈某某等2人枪杀，沈某家人回忆，当时血水流淌睡床，透过床板渗入房内泥地，其境甚惨。同日，日军窜入梅西各村，将村民傅某某等2人绑押至盘峙码头。第二天，岛民在海涂上发现傅某某等2人尸体，受害者身上捆扎着粗铁丝（日军在船上将受害者沉至江中溺死）。

据乡志记载，抗战时期，日军先

后四次登陆梅山岛，枪杀、刺杀、烧死、溺死岛民13人，烧毁民房170余间，烧毁木船1艘，强奸妇女10余人。罪恶滔天，罄竹难书。

前几天，我在路上碰见曾在梅山某乡办企业工作过的沈云芳老人，他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当兵的，当兵比我早得多，用我们当兵人的话来说，我应该叫他“老兵”。我说老兵呀，我想写篇反映抗战的文章，你有这方面的素材吗？他说：“抗战时期，阿拉梅山岛的情况我知道的也不多，但有一点我想来想去总是感触颇深，据我所知，当年来梅山岛的东洋鬼子实际只有一个班的兵力，就八个左右吧，我们梅山岛三千人总有吧。但他们面对手无寸铁的乡民，却可以如入无人之境，忘乎所以，横行不法。那时候阿拉中国落后呀，再讲武器也推板（差劲、质次的意思）。现在阿拉国家强大了，其倒敢来试试看！”我说，你说得很对呀，国弱被人欺嘛。

今天，我们梅山的老百姓生活在和平安定的社会中，但我们并没有忘记过去那段悲痛的历史，没有忘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一辈梅山人，对当年日本侵略者在梅山犯下的罪恶行径，更是切齿痛恨，刻骨铭心。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义成碶

■ 钩 沉 □ 陈一鸣

小浃江发源于鄞州东钱湖和太白山诸山脉，流经五乡碶过鄞镇桥入小港境内。河道迂回曲折，分支纵横交错，曾经是远近闻名的航运和通商要道。

宋代之前，小浃江上还没有碶闸，东海潮水可以直接抵达鄞州五乡。明嘉靖三十五年，定海（即后来的镇海）知县宋继祖在东岗山麓下建起了一座5孔的碶闸，这就是东岗碶。碶闸蓄淡御咸，既能灌溉农田，又能防止倭寇船只长驱直入，一举两得，起到了水利和军事的双重作用。

清乾隆年间，东岗碶周边形成了风景宜人的景象。东岗碶下约三里处的小浃江边上，有一座小山叫做灵芝山，山的西麓有座普庆庵，其主持净月上人把四周景色归纳为“芝山十景”，即：灵芝佛刹、小浃雄潮、茅洋秋景、蓬莱山色、剡潭潭深、画丝岩耸、两碶夹湍、罗峙悬山、乌石朝霞、陈山狮石。诗人胡僧为其和韵诗十首，其中《小浃雄潮》诗云：“潮音时入耳，带水亦盈盈。夜月声初寂，晨光势早迎。巫山穿滟滪，沧海接蓬瀛。不羨匡庐顶，莲花漏几更。”

此时的东岗碶，已经满足不了下游新增成农田灌溉的需要。于是，在距离东岗碶下约5里处叫做徐家洋的地方，由当地人徐起南变卖产业筹资建起了燕山碶堰（也叫堰山碶）。工程于嘉庆十二年（1807）动工至嘉庆十三年（1808年）3月竣工，总计花费8000余贯。

史载嘉庆十九年（1814）江南大旱，谷物歉收，第二年春天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地处燕山碶下游的小港，灾情更加严重，可谓“喧攘遍于村墟，饥饿声不绝于耳”。地方士绅乐涵和胡钧在街上设粥局赈济乡人，这时有人建言说：每次灾荒你们都出钱赈济，还不如兴修水利更好。八年前徐起南迁东岗碶而建燕山碶，这次干旱碶内农田就大大减少了影响，现在如果移燕山碶而新建碶，使小浃江两岸荒滩都变成良田，淡水都能遍布乡里，这样就能永久旱涝保收了。乐涵和胡钧一合计，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于是立即会同乡里士绅耆老商议建新碶事宜。很快，新碶工程于1815年秋天破土动工，1816年夏天碶桥合拢。这一年又是大旱，想到工程完工以后可再无旱灾的担忧，参与筑碶的人们心情更加亢奋，抓紧施工。当时参与筑碶的石匠以及土地丈量造册、催费采买、督工和书记等总共有一百多人。

因为这道碶闸靠近小浃江出海口，风浪侵蚀更大，所以石料需加倍坚固，砌筑须更加缜密，并且要加宽加固。工程完工时，合计造碶费用约一万二千贯。当初沿江各村约定，新垦的贫瘠田每亩分摊出钱，熟田按亩捐费不等。但大家毫不吝啬，出钱出力，资金全部到位。

碶建成后，在1817年冬天某日，选吉时举行刑牲祀神，县令戴舞到碶上拈香祀神时，对胡钧和乐涵说，你俩倡议发起这样大的工程，只用了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就顺利完成，过程中没有一个无赖地痞来闹事，也不用官府来操心，真是非常的顺利，靠的是大家的一片公益心和义气，可谓是“以义创之，以利成之，而义成之利，可收之千百世而无穷。”于是把碶取名为“义成碶”。

乐涵，就是不畏强暴为小民伸冤、伸张正义的机智人物乐贤先生，在民间素有“镇海徐文长”之称，在北仑知名度较高。据县志所载，乐涵为清嘉庆三年（1798）举人，曾任景宁县学教谕，不久即归乡。昏晨寒暑，手不释卷。建义成碶、修学宫及鮀池书院。晚年在家宅之西建“思园”，教授子嗣读书。年六十八卒。著有《望杏楼诗稿》。

而知道胡钧事迹的人就少了，光绪《镇海县志》载：胡钧，字竹安，小港人，胡僧孙，有文誉。嘉庆十一年（1806）举人，考取咸安宫教习。二十五年（1820）中进士（也就是建成义成碶三年后中了进士），道光三年（1823）开始任湖南武冈、安仁、邵阳、长沙等知县，善于断案。补授湘乡知州。道光十二年（1832）升迁郴州知州、长沙知府等。甚识人爱才，其薪俸收入大多资助贫寒子弟及其同僚。死后身无长物，行李仅书画琴瑟一筐而已。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义成碶下游建起了浃水大闸，历经一个半世纪的义成碶像一位年迈的老人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了一座碶桥。

流水无言，碶桥有情。回望二百年来，小浃江两岸经历了太多历史风云，太平天国运动、抗英、抗法、抗日、解放战争，在这里一一演绎，留下了无数抑强扶弱、急公好义、抗击外虏、英勇不屈的故事。今天，当我们全力发展经济时，更需要挖掘和传承先贤的美德。因为这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守住了它们，就是守住了我们的精神家园。

退休后，我们六位插友每年都要到霞浦当年插队的村子看看。昔日我们六人虽落户在四个不同的村子，如今进村后却有一共性：都爱找老人、老房子、老地方。看望老人，渐渐地不能完全如愿，这是自然规律使然；老房子所剩无几，稀有的“瓦爿墙”成了我们眼里的“文物”；老地方则旧貌变新颜，让我们驻足现场，感叹不已。

今年初夏，我们又踏上怀旧路。在某村，有一座算得上是“风采依旧”的大墙门。跨过高高的石质门槛，穿过洁净的大院，我下意识地仰望高处，这一长溜屋檐下，当年该是一条条铁质广播线，粗大的木廊柱上相距甚近地挂着一只只广播喇叭。“镇海县人民广播站，本站早上播音开始了，今天是×月×日，星期×，农历×月初×。下面预告节目……”身处这座农闲时曾是社员们集散地的年代久远的老宅，我的耳畔仿佛又想起了四十年前女播音员用方言播送的广播节目。

那个年代，收音机尚是公众眼里的奢侈品，尤其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家中安装一个广播喇叭是人们很自然的选择。那时每个大队的大队部或代销店里都装有广播喇叭。社员们则自愿申请安装，其手续简单，支付的费用也不高，所用喇叭通常为直径6吋半（英寸，165毫米）的舌簧喇叭。喇叭被固定在刷过油漆、正面有一个圆孔的木质盒子里，圆孔上蒙有一块薄布。木盒一侧装有一只有三个档位的拉线开关，可使喇叭分别处于重音、轻音、静音三种状态。

喇叭安装的位置各不相同。在拥有独门小院落的农家，户主多半爱装在走道的屋檐下；居住条件差的则装在一家人吃饭的低矮小屋里；有的将喇叭挂在众家堂前门的上方。当然也有非同一般的：冬日里，让置于“轻音”档位的喇叭盒低垂在就寝的“衣柜”上方，这样既能在早上首次播

北仑新区时刊

回忆在线广播

■ 往事

□ 叶向阳

音时“喊醒”自己，又不影响家人睡眠。我的邻居华哥就是如此。其实华哥的做法在我落户的二队并非唯一，说来也有其理：那时别说亮晶晶的手表可望不可及，就是普通的座钟，也并不是家家都有。许多勤于劳作的人们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清晨早起可赶在生产队出工之前去伺弄自留地或手持“赶蟹”、“刮刮网”等渔具去河边、池塘转一圈，以期改善晚上饭桌上的菜肴面貌。如此，广播喇叭对勤快却又好睡的华哥们来说实在就是一只精准的闹钟。

在线广播的栏目内容紧扣农村特点，具有较强的针对性。除了早上6:30和晚间8:00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牌节目《新闻和报纸摘要》几十年雷打不动之外，农村新闻、农业科技、支农快讯、植保知识、防灾抗灾等是县广播站的“主打产品”。一日三四次的气象预报更是上至生产队长下至每个社员极为关注的重要信息。社员们将源自广播的作物植保、禽畜饲养、粮食储藏等知识在田头劳作时相互传授、交流、切磋。可谓“活学活用，现买现卖”。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种叫“除草醚”的化学除草剂在农资商店亮相不久，小青年们身背喷雾器在田头作业时，植保员洪伯对一些注意事项总是千叮万嘱，并不时会冒出一句：“广播里也是这样说的。”

当然，文艺节目也是比重较大的板块，其中成天冲击耳膜的当属“八部样板戏”。说真的，那几出现代京剧的唱腔如今我都能基本无误地哼下来，除了因下乡前常与收音机打交道之外，能获此“成绩”无疑要归功于农村高密度安装的广播喇叭。继“八部样板戏”后，又有了“新编革命历史歌曲五首”。于是很长一段日子里，村子每个角落都响起“冲，冲，冲！我们是开路的先锋……”“工农弟兄们哪，我们是一家人哪……”那经改编的歌词，短期内让我极不适应。“我是公社小社员哪，手拿小镰刀呀，身背小竹篮呀，放学以后去劳动……”轻快的手风琴旋律伴着清脆的童声从大队代销店高悬的广播喇叭里飘出，店堂里一个小女孩情不自禁地闻声起舞，想来是村办小学的老师很前卫地利用了刚出版的《战地新歌》辅导了她那乖巧的学生。在农村几乎无收音机、录音机的年代，小女孩能如此应景，有线广播的作用可谓发挥到了极致。

广播喇叭，这当年农家唯一的“家用电器”，它突出的实用性和娱乐性使其平日里极少处于静音状态。缘于此，每当有农家的喇叭出了故障，我便成了“火热的上门师傅”，我那支自制的“美孚灯烙铁”也常有用武之地。记忆中，喇叭“全哑”的故障不多，最常见的现象是音量小、音发沙。原因不外乎传输线严重氧化使电阻剧增、入地线周边土壤太干燥（倒一些盐水便奏效）、舌簧片移位或金属杆脱焊、磁铁磁性减弱，偶见档位开关里的降压电阻变值。

广播站每天播音三次，开播时间分

别是早上5:45（双夏期间提前1小时左右播音），中午10:25，傍晚4:50。开始曲均为钢管乐《东方红》，晚间8:30以《国际歌》结束一天的播音。

“哎哟，广播响了，我还没烧饭哪，犯关类，马上要放工了！”冬日中午，某主妇悠然地享受着和煦的阳光，正在屋檐下十分投入地与大婶大嫂们聊着家长里短，忽听得喇叭响起《东方红》乐曲，她如梦初醒，于是急匆匆返家上灶台……“广播饭”，这是那个年代乡间耳熟能详的名词。

那时各公社也有功率较小的广播站，设有结合本社情况的“自办节目”。其内容多为各大队的生产情况、水利建设、好人好事等，节目时间一般在十分钟左右。1971年夏秋大旱，我所在的生产队早、晚稻却喜获丰收，公社广播站用通俗的方言播报此新闻时，喇叭旁的社员们个个喜上眉梢。插友“夫子”因在海塘工地表现出色，曾被县、社两级广播站扬名。有时也会有公社革委会的紧急通告、会议通知等通过广播站播出。一次偶然机会我去公社广播站，它设在公社那座很气派的大宅院的二楼西侧。站内靠壁处放着硕大的铁壳电子管广播扩音机，静卧的四速电唱机的一旁有不少色彩薄膜唱片和黑色胶木唱片，话筒头用红绸布包裹的送话器置于播音桌的正中，年轻的女播音员正在整理“自办节目”的文稿……

似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回荡在乡村上空的有线广播声悄然消失。近日听说上海部分农村地区应当地村民要求，准备重建有线广播网络，未知村民们何时能如愿。如今，许多久享清晰的调频广播、已离不开电视节目的过来人，时不时还会想起那连着家家户户的广播线和墙上的木盒子。如同吃着香软的大米饭，忽又怀念起昔日的番薯干粥；住在漂亮的独门独户的楼房里，还回味着曾经闹哄哄的大杂院；操控着全自动洗衣机，却惦记着窗外的河埠头……人们就这样在抚今思昔中感受着社会的进步，享受着时代发展的成果。

臭苋菜股

■ 美食 □ 谢良宏

去年母亲腌下的苋菜股现在拿出来可以吃了。从前，臭苋菜股作为乡下人的“长下饭”，母亲每年都会腌上几甏，这似乎已成为她的一种习惯。

苋菜梗一般是每年七八月里收获上来的，大多是自家的自留地里种植的，切成一段一段的就成了“苋菜股”。这几年随着两老年纪慢慢地大了，种的东西也少了。现在，苋菜股多半是母亲从集市上买来后“熟腌”的，就是将新鲜的苋菜梗切好后，上锅蒸熟，冷透之后加点传统的臭卤。

母亲过去一般的做法是“生腌”。即将切成段的新鲜苋菜股直接放到坛或甏里，每放两三层苋菜股，就撒上一层盐，然后倒点臭卤，最后压实、密封。时间长一点的话，夏天腌的苋菜股差不多要等到年底时才能吃。

母亲说，“生腌”的做法并不难，讲究的是用来“密封”的东西。母亲多半用的是荷叶或竹叶，叶子上有气孔，这样坛甏里才不会缺氧，有利于霉菌发酵。

生腌的苋菜股一般中间是坚实的，而两头却是空心的，吃起来生脆爽口。

吃臭苋菜股，好多人追求的就是那种臭得要命、入口却很鲜美的感觉。

臭，最好是隔年留下的，感觉粘稠滑溜，最重要的是“臭中带鲜”。至于臭卤的做法，记得原料中有黄豆、豆腐、盐，然后让它们慢慢地腐烂发酵，使之烂成绿油油、肥腻腻、臭烘烘的卤汁，这就是所谓的“烂肥臭，臭生香”；然后在这道工序的基础上，将笋根浸到臭卤中，让其释放出鲜味；再把烧红的铁火钳放进臭卤里搅拌，到铁火钳不再“嗤嗤”发声时，拿出来再烧红，再淬，如此反复多次，直到臭卤的气味变得浓郁而醇和。

臭苋菜股的另一种吃法是做浆（羹）。待镬里油热，把苋菜股倒入镬里翻炒几下，然后放入水，煮开，再将用水拌匀的早稻米粉倒入镬里与苋菜股拌和，最后撒上葱花、浇点麻油，一道喷香可口的臭苋菜股羹就做成了。这道菜尤其适合老年人的胃口。

父母的遗物

■ 感怀

□ 张小红

一支特大号派克金笔，一套土布白衣黑裙，每当见到父母留下的这两件遗物，总会让我想起他们曾向我讲述过的他们在抗战期间亲历的往事。

70多年前，年长父亲十多岁的伯父，在上海办了一家“中元塑胶厂”。父亲则在宁波效实中学读高中。

全面抗战爆发后，伯父毅然决定把塑胶厂迁移到大后方昆明郊外，继续生产。他看中了略懂英语又有文化的父亲，就要父亲随他一起去昆明，做他的助手，担负原料进货和产品销售的重任。

走，还是留在老家？“当时，你伯父让我自己选择。这选择，却有多难。我刚和你妈订了婚，说好两三年内就要迎娶。这一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

最终，父亲还是中断学业，和伯父一家一起去了昆明。

昆明郊外，简陋的厂房和住所，生活上的不适和艰辛不待言。父亲更是一次次冒着生命危险，经滇越铁路或滇缅公路，辗转香港，再绕道几个城市，历尽千辛万苦完成原料进购和产品销售任务。

当时父亲有一个愿望，即想拥有一支大号钢笔，可以记录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想。

一次，伯父带父亲去陈纳德将军率领的美军“飞虎队”办事，伯父和这些来中国参战的美军飞行员关系很好，常有往来，也常互赠物品。父亲看中了一个大个子飞行员手中的一支特大号派克金笔，伯父就把带去的食物送

给了那个飞行员，飞行员也慷慨地把笔赠给了父亲。

这支罕见的特大号派克金笔，一次可灌墨水四十几滴。父亲如获珍宝，一直携带在身，记录下旅途所见的日寇暴行和大好河山遭蹂躏的情景。曾有几篇“旅途见闻”的文章，通过伯父的朋友，刊登在上海的《申报》上。

直至抗战胜利，父亲拿着一大叠此前无法传递的家书回到家乡，这才与母亲完婚……

母亲留下的那件月白色土布上衣和麻纱料质的黑色百褶裙，按时下的眼光来看，无任何收藏价值。但母亲在世时，对它们很是珍爱，尽管后来年纪大了不能再穿在身上了，但她仍坚持年年“晾梅”，一直舍不得扔。

当年在上海读书的母亲，于“九一八”事变后辍学回到老家镇海，后来又到大碶“天堂堂”，照顾她寡居的外祖母，并在“时敏小学”（今北仑区实验小学前身）任代课小先生。当时，“时敏小学”的校长和两名年轻教师，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发展了我母亲和顾更清等三个年龄较大的学生为地下共青团员。在学校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母亲他们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去。当时镇上的地下党组织发动群众掀起了一场“抵制日货”运动，母亲总是穿着这套土布白衣黑裙带领学生上街游行，或上台唱抗日歌曲。

许多年以后，我们大碶镇文学创作组邀请顾更清老师来为我们讲抗战中的往事。他对我说：你娘平时文雅怕羞，但她带领学生上街游行却是领头呼喊口号，声音很响亮。她还会唱许多抗战歌曲，常常上台独唱，也教学生唱……

如今，这两件父母遗物在我眼中可谓弥足珍贵！那派克金笔笔杆上庄重大方的深红连圈花纹和笔端的那点金色，似乎让我看到了当年父亲执笔书写时的年轻身影；而母亲那套已然泛黄的土